

戰後日本農民的分化與選票的移動

·上·

孔祥銘

新近故世的日本思想家小泉信三，在數年前答覆我的一次訪問中，曾經比喻日本政局好像一片海洋，海面是流動的，一陣風就會吹起一片浪，波浪拍打海岸，呼呼作聲，但是海底是平靜的，其中別有幽景。當時正值日本反安保鬥爭最激烈的時期，他指出這僅是浮面的現象，但都市的浪濤無損于農村的安定。一般視農村為保守政黨的地盤，亦是因為他們祇着見戰後農村安定繁榮之故。

戰後新憲法公佈之後，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即實施一連的法律改正，先後經十次之多，有關地方議會及地方公共團體首長（任期均法定為四年）的選舉，自一九四七年開始，每四年一次，已經有過五次之多，本文係就歷屆選舉加以統計分析，並且引用學理，草成本稿，以見近年日本農村變于漸，遷于微，其微視世界中亦有至堪注意者。

一 地方選舉與政黨色彩

由于地方政治之「非政黨化」，故地方選舉當選者之政治色彩，亦不若國會議員之鮮明而濃厚。市、區、町、村議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本屆為百分之八五），均以無所屬當選。市、町、村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亦為無所屬。至縣議會議員與四十六都道府縣知事，則其政治色彩逐漸濃厚，縣議會的政黨化，已甚明顯，無所屬席次漸減，無所屬或小黨派的議員，紛紛投入現存政黨，自一九四七年以來，無所屬的席次比率，由百分之三九，減為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二七，而自民黨的席次由百分之四四，增為六十，革新政黨的席次由百分之二七，增為二三。我們知道當時無所屬的縣議員，大多屬於保守勢力，故保守陣營的實力應為百分之八三，而革新政黨為百分之二七。以後農地改革開始，各地展開農民運動，社會黨的得票率較有進步，以

戰後日本農民的分化與選票的移動

後一進一退，其間，一九五五年似乎是一個分水嶺，是年地方選舉，屬於自民黨的縣議員約占百分之四六，革新政黨百分之二一，無所屬百分之三三；至一九五九年，無所屬減少，至本屆愈為減少，統計自民黨與無所屬兩者合計，約占百分之七七，革新政黨佔百分之二三，較之十六年前，保守與革新兩陣營的進出為百分之六，執政黨之失，亦即反對黨之得。然而將地方議會的實力與眾議院相對比，則革新政黨在地方上顯然處于劣勢，因為他們在眾議院中所佔席次約達百分之三十弱，而在縣下各級議會中僅佔百分之二十左右。

就單純的數字觀察，自民黨在地方議會中雖仍佔有絕對優勢，但比四年前已見低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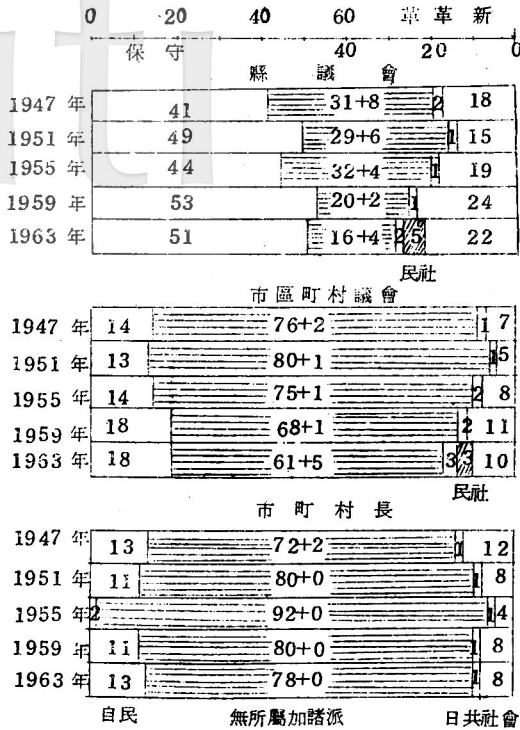
分析其他各政黨的地方力量，民社黨在五大市議會中佔百分之二三，尤其在大阪市最佔優勢，超過社會黨，成為該市議會的第二黨。創價學會的公民政治連盟，（簡稱公政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改名為公明黨）佔東京區議會的百分之二三，五大市議會的百分之十，特別是在東京區議會中，比社會黨席次還多。在東京都二十三個區議會中，有十一個區均為公明黨坐居第二黨地位。將一九六三年與五九年的兩屆五大市議會議員構成，加以分析，則四年之間，自民黨失了百分之十，革新政黨增了百分之三，自民黨的減少可能即意味著公政連的增加。

分析當選者的經歷，得知地方政治領袖多是一些前任的議員及首長，佔百分之六十；新人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過去會擔任議員或首長者不足百分之十。知事二十人中有十八人，皆係前任的知事。

就各黨派得票率來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在五大市議會的選舉中，自民黨失去百分之十一，革新政黨增加百分之八，公政連獲得了百分之十一。東京

區議會選舉，自民黨失去百分之六，革新政黨所得有限，而公政連得了百分之十一。公政連于一九六四年改稱公明黨，係以「創價學會」為背景，該會自一九五四年開始政治活動以來，十餘年間獲得長足進展，一九六二年的參院選舉得票超過四百萬的目標，震驚日本政壇，構成其政治力量的社會條件，當在另文分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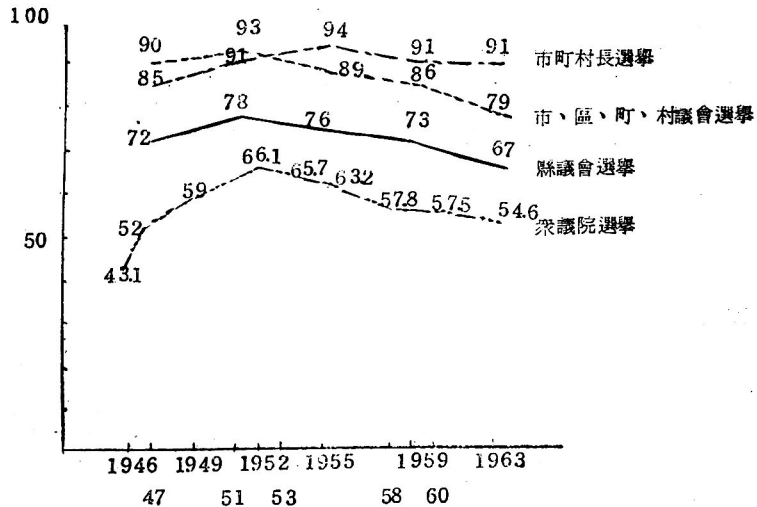
表一—A 保守、革新之得票率



就時間序列來分析各黨派的得票率如表一—A所示，縣下各級地方議會自民黨的得票率均有增加，而且佔絕對優勢。另一方面，革新政黨也有增加，所增比率亦復不小。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無所屬的得票率在縣議會這一級中，已顯見減少，由此可知中立派的得票，是向兩方面分散了。因此，我們需要將自民黨的得票率與無所屬的一起統計，以見歷年的趨勢，其結果如表一—B所示，從一九五一年至五十年代，保守勢力均有進展，從一九五五年以後，逐步後退。這一趨勢線與眾院選舉的趨勢線，大致近似。歷屆眾院選舉中，保守政黨在一九五二年達到最高峯，得票率佔百分之六六·一，次年總選舉亦不壞，達到六五·七，以後連續減少，逐漸下降，雖其減少的步

度是緩慢的，但十年間失却百分之十一·五，却不能說是一個慷慨的讓步。惟保守勢力在縣級以下的市町村中的勢力仍甚鞏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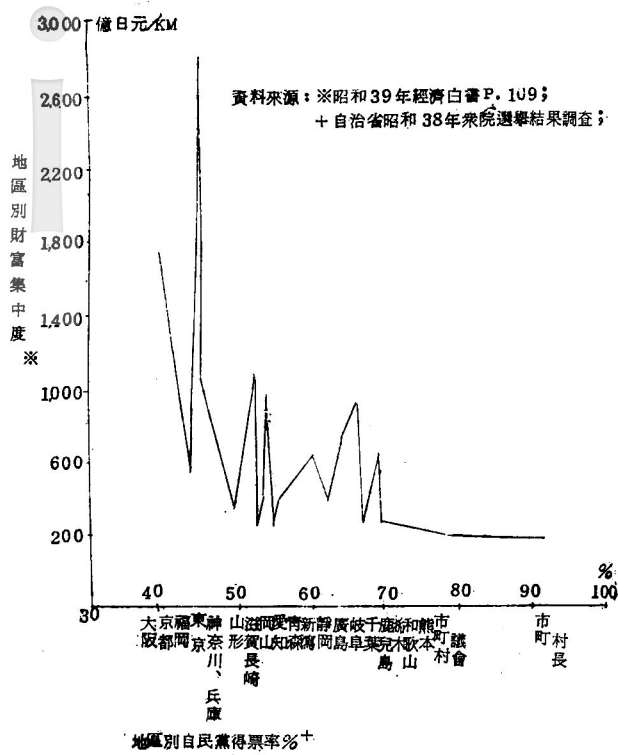
二 農民票移動的趨勢



表一—B 保守政黨及無所屬歷年得票率

根據上文分析，我們再將日本的政治地圖與她的產業地圖關聯起來，把政治指標的得票率與議會勢力分配，和經濟指標的財富及人口集中度，使兩者描成一張相關圖，則可發現幾個層次如表一—C，一—D所示。我們從圖中可以看出見一個陡聳的高波，那就是東京，自民黨在這裏僅有低度的得票率，而革新政黨却有較高的「人氣」(Popularity)，第二個高波是大阪自民黨同樣的缺乏「人氣」。從圖的左角可以看出見一條平穩的曲線，那就是

表一C 財富集中度與政黨得票率之相關



自民黨的地盤票，這些地區主要是低所得的農業地帶，社會的流動性少，人民保守，而支持自民黨者佔絕對多數。在高波與低波之間，橫置著縣級與新興都市內的中間層，中小企業者，手工業者，以及兼農出身的工資勞動者，他們似乎感受到極大壓力，而徬徨徘徊。現在試看日本政治地圖上的幾個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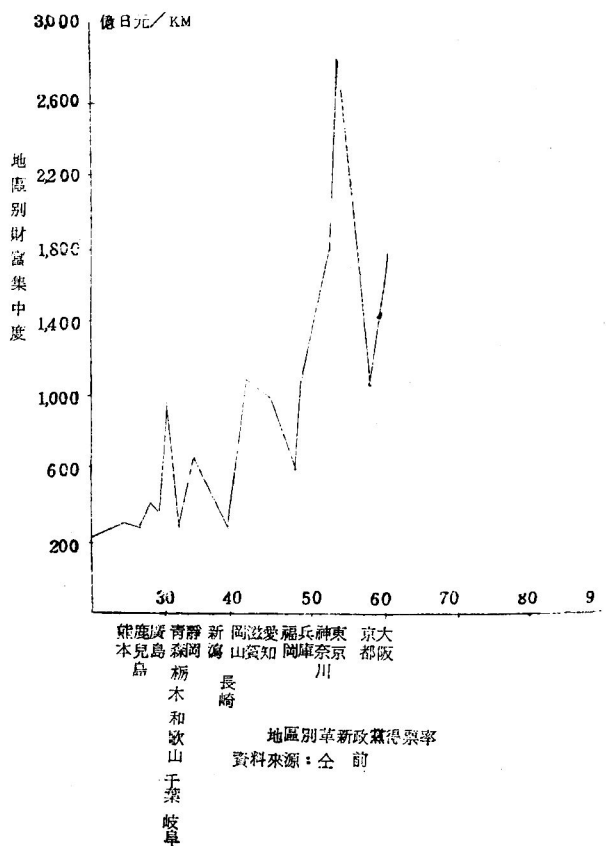
(一)最浮動的一層是在大都市，尤其東京和大阪，保守與革新兩派的得票率完全逆轉。一九六三年第三十屆衆議院選舉，兩陣營得票率爲東京都四四對五三；大阪府三八對六十。

(二)正在動搖中的一層是在都會近郊和五大市，自民黨已遭受新的挑戰。五大市議會兩陣營的席次分佈爲四〇對三八；得票率三六對四二。

(三)比較穩定的一層是在縣級及縣級以下的議會中，保守黨勢力仍甚雄厚，各縣議會席次，兩陣營的形勢爲六〇對二三，得票率五一對二九。

戰後日本農民的分化與選票的移動

表一D 財富集中度與政黨得票率之相關



(四)最穩定的一層是在縣下的市町村基層，那是自民黨的地盤，市議會席次的百分之六七，及町村議會的百分之九五，均爲無所屬佔有，但他們均受自民黨之影響與領導。

如果將上述四個層次依照政治穩定性的高低，橫成一張曲線圖，則其曲線的構成適與前文表一的形態相反，即(一)資本與人口愈是集中的大都市，其人民的投票型式愈不穩定；(二)資本與人口正在趨于集中的地帶，(我們姑稱之爲壓力地區)，其人民的投票型式亦開始變化，而且顯得浮動；(三)在農業縣區，投票型式的變化不甚顯著；(四)愈到基層的農、漁、山林地區，其國民所得潛力愈低，而其投票型式愈加穩定。

如果投票型式的變化，可以作爲一種政治安定的指標的話，則變化愈多即是表示政治安定性愈低，反之，變化愈小即是表示政治安定性愈高。李浦塞在其「政治人」一書中提出一項經濟發展與政治安定性的實證分析，謂富

裕度愈高經濟愈發達的民主國家，則其政治安定性愈高。日本的場合似乎無法應用李浦塞的理論來加以解釋，則豈非李氏理論的虛妄？抑是日本情況特殊，而需要另覓新理論以代之？此節已在第四章中論之。

三 農民投票行為的因子分析

就日本的經濟社會發展史觀之，還不能說她是一個民主化已經成熟的西歐型國家，祇少在農村中，這一產業化的、都市化的、西歐化與現代化過程，尚在進行之中，上文已就都市化開始之後農民投票行為中屬於初步社會變動之若干現象，加以分析，現在更進而研究在這變動過程中，有那些因子被牽涉在內？

島根縣是一個原有九十餘萬人口的農業社會，從一九五五年以降，人口漸減，如以一九五五年為基準（指數一〇〇），則一九六〇年減了四・三％，六二年減七・三％，六四年減一〇・四％，現有人口僅八十三萬三千餘人。農家總數亦逐年減少，由一九五〇年的十萬戶減到六三年的九萬九千戶，而兼業農家由六四・四％增加到八四％，其中一半以上為第二種兼業農家。

這一個數字，與十年來日本農村人口外流的速度，和兼業農家增加的比率，甚為接近，在其選舉行為中，島根縣民表現了下述數種型態：（註十四）

（一）選民對於切身的事件比較關心，因而對地方選舉亦比縣議員選舉及國會眾議員選舉更為關心。在市町村的階段，農民的投票率為九〇％，縣知事與議員的階段減少為九〇％以下，眾議員的階段則更降為八五％以下，對參議員的選舉，投票率更低，約在七五％左右。拿島根縣與全國大都市的投票率相比，往往超過後者一〇％，可見鄉民對於政治雖未必有濃厚興趣，但對選舉一事却甚認真。

（二）農民對於自己投了票的候選人，其信賴程度，亦視對象而定，如對市町村議會議員的信賴度，較高于縣議會，更高于眾議員，而對參議員候選人的信賴度則最低，四項的比率為四二・二％，二六・九％，二三％，一七・二％，回答不知道的各為三〇・五％，四五％，五五・二％，六〇・八％。表示農民對於眾議員和參議員的人格缺乏認識，故不置可否。他們對於市町

村的議員，亦有三〇％以上的人回答「不知」，二七％以上的人回答「不信任」，可知在基層政治中，農民的態度亦是持保留或批評懷疑的態度。

（三）農民對選舉的關心程度，表示積極關心者為五〇—六〇％，毫無關心者四〇—五〇％，尤其女性對選舉的關心度最低。

（四）對政治關心的農民，其對政黨的支持程度為支持自民黨者四〇％，支持革新政黨者三九・七％，不知道者一三・三％，可見在一般性的民意測驗中，保守、革新兩陣營已有平分秋色之趨勢，而自民黨在下次總選舉中仍獲得優勝之原因，究竟何在？我們在下一問題中得到一些線索。問題是：「爲了市町村的發展，你認爲是否與特定的政黨結合的好？」回答「結合的好」，五二・七％，回答「隨便都好」一七・一％，回答「不好」一二・四％，其他一七・七％，可見半數以上的農民爲了本地的繁榮發展，認爲應當與現存的特定政黨結合起來，才能達成目的，由此可見，選民對於候選人的期待，多是一些現實的切身問題，如道路的擴展修補，橋樑的改善新設，自來水、醫院、土地改良、農會與漁會的改善，漁港的修築，災害的救助等，均與住民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可見可聞，可以觸知的切身問題。以之比較國政、縣政之重視政策及一般性問題者，其關心程度，顯有不同。

在農村中，上述這些切身問題，往往須要仰賴「組織」運用集團的力量去交涉，而後才易獲得政府的首肯。農村中的組織以「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漁業協同組合」（簡稱「漁協」），「森林組合」及「農業共濟會」等團體最有力量，他們是地區的經濟團體，亦是地方的壓力團體，擔任這些團體的重要幹部，多數兼任市町村議會議員，或者是戰前的地主，有身家名望之士，這些幹部既一身兼爲職員與地方名士，自然與縣議會議員及國會議員須要互通聲氣，相互協力，故中央與地方的議員既是一線相聯，而村長，村會議員，農協役員，教育委員，民生委員，農業委員等等，又都是同系的人物兼任，其結果是自民黨、官僚、地方團體幹部自然結成一個體系，與以勞工組織爲中心的所謂革新政黨，相互對立。自民黨的農村組織，除了上述者外，尚有「鄉友連盟」，「遺族會」等舊軍人團體，彼輩與左翼政黨的「原水爆反對運動」，「母親大會」，「日青協」等對立。因此之故，農民爲求解決其切身利害問題，勢非維護保守陣營不可。這個系列化的支配層級，即村落幹部—官僚—政黨的戰後支配型態，是否已經遭逢新的挑

戰，此為本節主要的論點。在未進入此項討論以前，請先介紹山田教授的同調查結果。據其報告，「農民之大半仍是有力量集團的意識及行動同調，而且顯然可以見得農民對於政治的關心是消極的，甚至毫無關心可言。他們在選舉的時候，乃是投的同調票。」（註十五）支配其投票行為者，依然是傳統的「義理人情」意識，以及農協等地方團體之組織壓力，與通過血緣、地緣關係的「人情票」，所謂地盤票者，其構成內容大致如此。當國會議員候選人參加競選時，除了利用前述支配層級的影響力而外，並且動員地盤票以贏取選舉之勝利。

以島根縣為例，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在戰後九次選舉中，兩陣營的得票率幾乎已經固定化，這表示地盤票一經鞏固，很難把它打破。戰後第一次選舉，革新政黨的得票率為二四·三%，另外加上一名革新系無所屬候選人的得票率，亦僅二七·五%，而保守政黨及保守系無所屬候選人的得票率，合計為七二·五%，第二及第三屆選舉時，由于農地改革開始，農民運動高漲，革新政黨得票率大增，其後到一九五二年，又恢復第一屆局面，此後兩陣容的得票率一進一退，保守得六五·七%，革新得三四·二%。十八年間經過九次選舉，兩陣營的得票率大概在七%左右移動。以一九六〇及六三年兩次總選為例，革新政黨的得票率全國平均增加了一·三%，大都市選舉平均三·三%，而島根縣為三·五%。

島根縣的個案，引起我們興趣的第二個事實是：該縣在最近數年中，農業人口銳減，農家兼業激增，而另一方面，中學畢業生的百分之百，相率流入都市或近郊謀業。最近一年間各村農業人口減少平均三·三%，這顯然與農家脫離農業，以及農家子弟外流所造成的結果，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兩年間農業人口減少三%，等於過去十年間的減少數字。二年來兼業農家增加的數字為五·七，其中第二種兼業農家增加率為五·六%，可見增加的兼業農家都是以農為副的第二種兼業。

如果把這一系列數字編成一組相關系數來表示，可以發現下述四項因素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關係，即：①農家與農業人口的減少；②兼業農家，尤其第二種兼業的增加；與③革新政黨得票率的增加；以及④自民黨得票率的減低，具有相互連帶的關係。這四個因素中的①②兩項實際可以合成一項，③④兩項也可以合成一項，把兩者集合而考察之，我們可以作一個假設來

說：即農業構造的變化與政治體制的變化，構成相關關係。換言之，最近國民投票行為的變化，其原因之一，可能由于農民政治意識與社會態度發生變化所致，而促使農民政治意識變化的直接或間接因素，自得先從農業構造的變革中去求之。職是之故，我們曾將戰後農地改革以來社會變遷的過程加以分析，以為爾後政治分析之基礎。

日本的政治學者，對於近年來農民政治行為的變化，會有若干次的調查，綜合其要義，認為造成這些變化的因素，為①最近景氣的後退，農業經濟不振，物價上漲等因素；②電視普及，擴大了農民視野；都市的消費文化進入農村，引起了農民對都市的憧憬；③勞動運動的滲透，以及工場遷入農村，使農民的傳統投票行為受其影響；④中學畢業生流入都市就業，以及農家的季節性出動——即利用農閑，前往都市或郊區找尋臨時性工作，使農村與都市增加了意思交流的機會；⑤交通的擴展與城鄉經濟交流的密切。（註十六）

山田政治教授調查島根縣農家的電視收聽情況，謂農民對政治關心程度的增加，係由于電視的普及，譬如一九六〇年選舉時該縣全體的家庭中設有電視機者僅百分之七·八，而至一九六三年增為百分之五十四·五。電視節目提供他們很多關於政治性的話題，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並且影響他們思考的方式。（註十七）日本農村的電視普及率，自一九六〇年以來，由百分之十，增為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六七·九，一般農家現在兼用電視和收音機者，已甚普遍，其比率為百分之八九·七（即每百戶中有八九·七戶使用之。（表一二）

農村中誰是最先購用電視和電器用具的人？依統計所示，可知使用電器用具最多者，乃是兼業農家（經營第二種兼業的人），因此我們也有理由可以相信：最多收聽而且購有電視設備者，也是同一層的農家——兼農。

兼農的收入較專業為多，（註十八）而且在農家生計費中所化的比重，已達百分之五十，（註十九），在農民每一塊增加的收入中，來自兼業者達六毛五分七釐（即六五·七%）。擔任這些兼業的人，在年齡上多是廿九歲以下，尤其是十九歲未滿的青年；至於專業農家的平均年齡則為五十歲以上，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婦女，專業與兼業農家的比率為二一%對七九%，或二對八。假定這八成左右的農民，這些年輕、力壯、收入多，而且樂於接受大眾

傳播的兼農，逐漸改變了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方式，則日本農村的面貌，自然也將為之改觀。假定老齡化的農業，終久要與新興的都市資本發生矛盾的話，那末在他們還沒有形成這場衝突以前，可能是農家內部先已發生了齟齬。而且這些齟齬是否可能即發生在廿九歲以下的兼農與五十歲以上的專農之間？這在理論上是值得研究的，也是目前世界農業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者感到興趣，而正在研究的一個題目。本文目的不欲預言兼農將來的命運，或日本農業將來的狀態，這些問題將要留待農業學家去研究，我們從政治學的立場來考驗，認為此項問題的本質，應該從政策學的角度來探討，以期目前所遭遇的困難問題，通過適當組織的、計劃的行動，以導致其合理解決。

表一 農村電視及收音機之普及率

		電 視	普 及 率	收 音 機	普 及 率
一九六〇年	市區	三四八萬架	三〇·一%	八三七萬架	七三·六%
	鄉區	六六	一〇·一	五〇三	七六·五
小計		四一四	二三·一	一、三四一	七四·七
一九六二年	市區	七六七	五五·五	五八四	四二·三
	鄉區	二五四	三七·四	三六〇	五二·九
小計		一、〇二一	四九·五	九四五	四五·八
一九六四年	市區	一一三	七九·七	二二四	(九五·八)
	鄉區	四五二	六七·九	一四五	(八九·七)
小計		一、五六六	七五·六	三七〇	(九三·八)

註：一九六四年統計中()內之比率，係包括電視及收音機之所有者對全家族數之比率。

資料來源：農業年鑑一九六五年版P.三〇五

四 都市化的進程與農民層的移動

德國社會學家戴維(G. Teinies)及高達爾(H. Kotter)，曾在達爾姆謝特地方，調查當地如村落的農林，手工，商人及薪水階級，以及兼農農家與非兼農農家的生活方式及其社會態度，他們發現各階層的社會態度，各有特徵，對同一問題的答案，表現不同的性格，這些性格上的差異，可以分成幾個層次，而且沿着農民層→兼農層→非兼農層的秩序，逐漸顯示出保守思想的沖淡，和進步思想的加濃；愈到非農民的階層，其意識型態愈加表現得近代的，個人中心的傾向，愈到農民的階層，其意識型態也愈加是保守的，傳統的，家產中心的傾向。戴維說：「在都市化過程中，各階層所受的影響，逐漸顯示出程度上的差異。」他認為各階層性格的轉移和他們的脫農程度及資本投入量，有密切關係。愈是對農業有高度的依存，與農業有緊密的結合，則其從業員的行動半徑，愈是局限於封鎖的，傳統的，停滯的家族主義的生活構造和意識型態。

兼農的場合亦然。戴維的研究認為：(一)凡是遠離都市，住在森林地帶，而且農業經營規模較大的農林勞動者，他的家族制度色彩愈加濃厚，思想更加保守(七〇%)；(二)這種保守的性格，到了手工業及商人中間，就比較沖淡(六五%)；(三)兼農離開本鄉，前往市郊或都市兼職，其生活與社會態度立即開始轉變，由於他們的職場與家庭分離，而且生活的另一部份係在都市，故他們對家族的關心較低，保守態度也有顯著減退，且有近代個人中心的趨勢(三七%)。(註廿)

就農業，農村手工業及商業，通動的兼農三個層次而言，其性格的變化如以數字來代表，則為七〇%↓六五%↓三七%，愈到下面，其保守性愈低。

國際關係研究所叢書

- 俄羅斯史 每冊新台幣五十元
- 中共的土地鬥爭 每冊新台幣四十元
-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每冊新台幣八元
- 中國共產黨史論(英文本) 每冊新台幣二百元